

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话语建构

李晓红

内容提要 作为跨文化的重要文学载体,文学翻译在将文学内容从一种文化语境转换为另一种文化语境的过程中,承受着不同文化语境的冲击,并谋求在文化冲击中达到沟通、同构或整合,从而构建新的文学翻译话语。文学翻译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属于话语的范畴,文学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作者、文本和本土文化嫁接进目的语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对于原作的偏转和遗漏,以便加入目的语文化的权利对话,期间作者、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互为主体间性,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下共同构建文学翻译话语。

关键词 文化语境 文学翻译 主体间性

李晓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教授 311231

一、文化语境与翻译话语

“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led of Culture)。这一范畴应当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第一层面的意义,指的是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其第二层的意义,指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因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事实上各类文学“文本”都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1]。

话语是各种各样的文献形式、知识形式、文本形式和陈述形式的综合,是构成学科知识要素的总和^[2]。话语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斗争场所,是从某一角度理解世界的框架。福柯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

[1]严绍璦:《“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多边文化研究》第1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2]朱湘军:《从权力与话语看翻译之强势》,〔上海〕《外国语》2008年第6期。

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物质性^[1]。程序可以分为外部程序、内部程序和话语持有者的规范^[2]。话语规则是形成话语的条件,决定哪些话语可以流传以及如何流传。

文化语境和翻译话语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翻译话语反映文化语境,同时又受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翻译旗手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们的合著《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的介绍中指出:“我们不再为字词,甚至文本所束缚……我们已经意识到翻译语境的重要性。一种语境当然是指历史,另一种语境就是文化……翻译研究实现了‘文化转向’,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它们从来不能在真空中接受。”^[3]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名片,文学翻译以文学作品为翻译对象,属于话语的范畴。文学翻译不是一个仅以文本呈现的静态的产品,而是语言、文化、认知和社会相互综合的、动态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学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作者、文本和本土文化嫁接进入主体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对于原作的偏转和遗漏,以便加入主体文化的权利对话,期间作者、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互为主体间性,共同完成目的语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的转换过程和文学翻译话语的建构。文学翻译已然成为当时的文化话语和社会变动策略的一部分。

二、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话语建构的哲学理据

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收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4]。文学翻译话语的构建是一种叛逆,有必要对语言的认知和文化语境做哲学层面的思考。

传统的语言工具观认为:语言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语言符号联结的是事物与名称,而字面上的指称就是词的意义,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人们透过语言,对它背后的意义便能一目了然。建立在这种语言工具论基础上的翻译成了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只要精通两国语言,整个转换便显得轻而易举,在翻译过程中,原作是“上帝”,译者无权也无须对原文进行任何增减,翻译是“再现”、是“摹本”、是“如翻锦绮,背面俱华”等,而译者是“仆人”、“折射镜”,甚至是“隐形人”。

二十世纪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工具论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加西尔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语言或同一语言其他各阶段的分析。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所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传给他们一个多棱镜,而他们将用这面多棱镜来观察非语言世界。”^[5]这场转向所形成的语言哲学对西方思想文化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赞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们对语言的透明性和意义的确定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文本的意义不是词语意义的简单相加,要使话语产生意义并让意义流通,需要真实交流的行为和具体交流的环境,文学翻译是一个无止境的意义位移过程。如果一个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一社会和每一历史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习俗系统的产物,那么所有意义都是在历史

[1][2]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8页。

[3]Bassnett, S. &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3.

[4]许均:《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转引自许均、袁筱一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和文化之中生产出来的。它们永远不会最终确定,而是始终受制于变动,既在一个文化语境与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也在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之间变动。而且,不存在单一的、不可变的、普遍的“真实意义”^[1]。

文学作品是极特殊的语义系统,其目的是赋予世界以“意义”,但不是“一种意义”。一部文学作品,至少是批评家通常考虑的那种作品(这本身也许是对“好的”文学的一种界定),既非始终毫无意义(玄妙或“空灵”),也非始终一目了然。那意义可说是悬浮的;它把自己作为某种意味的公开系统提供给读者,但这有意味的客体却躲避着读者的把握。这样一种意义中先天的失意或迷惑(*de-capio*,无所获),说明一件文学作品何以有如此的力量,来提出关于世界的问题(通过发掘似乎在信仰、观念和常识属地的一定意义),却不提供任何答案(杰作从不“专断”);它也说明了一部作品何以能被无限地重新解释……^[2]文学翻译更是需要译者和读者去阐释、把握那些开放的、悬浮的意义,作者、文本、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之间的互动是文本意义得以理解的先决条件。

三、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话语建构

翻译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具体的话语实践,翻译话语正是在这样的内涵中获得意义。它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不仅包含翻译文本,而且涵盖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翻译的看法、评论以及对翻译文本的评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从描述文本为中心的语际转换扩大到更为广大的范畴即特定实践内文化构建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文学翻译成为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重写。借鉴福柯话语控制原则的三要素来透视阐释和制约翻译话语的无形力量,作者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与此同时,译者、目的语接受环境和读者的主体性地位也呼之欲出,他们都是文学翻译作品意义的创造者和分享者,是文学翻译话语的建构者。

1. 译者的主体性 所谓译者的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3]。文本的意义不是随便就能自显的,它不会像照相底版一样自动感应,译者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去侵入,去积极地捕捉意义。在阅读时,译者有任何一点分心、疲乏愚笨或漫不经心,文本的符号就会离他而去,符号所表达的各种意义就会深藏不露。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心灵和热情,调动自己的社会经验去体会、去捕捉、去领悟,才有可能从文本的字句入手,然后透过字句去捕获源语文本的意义,这个过程就是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过程。

译者的主体性行为主要体现在翻译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两个层面上。

(1) 译者文本选择的主体性

“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体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接着它最有利的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选择某些本体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再接下来,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使用形式使问题进一步

[1][英]霍尔编:《表征:文化表现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页。

[2]参见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四卷:社会——文化系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2页。

[3]许均:《翻译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

地复杂化。”^[1]

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了解西方、求富图强、救亡图存、民族革命和科学启蒙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理念,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自然紧紧围绕这些中心话语。严复在《原强》中指出:凡是可以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外国作品均可以成为翻译对象。梁启超在《论译书》、《佛典之翻译》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多次将翻译视为“强国第一要义”,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译者不仅构建了异域文本和文化的本土表述,而且也构建了一个能有力地维持或者修改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谱系和翻译话语。

“五四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人的文学”之大旗,宣扬个人主义;“五四运动”中后期,文学研究会又打出“为人生”的大旗,倡导文学要贴近和反映现实。在此情况下,文学翻译者开始关注国外的现实主义作品;抗日战争时期,受抗日救亡文化意识的支配,文学翻译的选材遵循“合于我们社会”和“足救时弊”的原则,侧重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语境再次发生变化,文学翻译的选材也出现了新变化:建国初期,文学翻译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作品的译介。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冷战和中苏关系恶化,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翻译选材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后,在兼收并蓄的思想指导下,文学翻译选材开始转向文化话语本身,在“文革”期间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毒素”的英美文学作品成为译介主流,各种流派百花齐放,异彩纷呈^[2]。

(2) 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主体性

翻译史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具体表现在“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忠实”与“解构”、“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选择,译者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实现对翻译话语的构建和权力的争夺,获得较多的资本,最终取得文化的支配权:“翻译能够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与文化价值,从而把那些看上去无助于解决本土关怀的争论与分歧排斥出去。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国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3]

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学翻译呈规模化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更是走向繁荣。在此期间,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大多数作家翻译与创作并举,出版物往往同时收录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就收有多首译诗或译文;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周作人的散文集《谈龙集》等等作品集都兼收了翻译和创作作品,体现了翻译与创作的同一性,其中翻译过程中译者增删、改写、转述、节缩等充分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自由选择,忠实的文学翻译标准被悬置,翻译处于文化“格义”的尴尬地位,“橘化为枳”的变异乃是常态。

拜伦的长诗《唐璜》第三章《哀希腊》在中国有四个译本:梁启超用元曲、马君武用七言古诗、胡适用离骚体、苏曼殊用五言绝句来翻译同一章节,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诉求,“重视政治启蒙的梁启超发现的是政治家的拜伦,而重视心灵世界的苏曼殊发现的却是艺术家的拜伦。”^[4]

“一名之正,旬月之踟蹰”,严复在“天演”(national evolution)和“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译名厘定中煞费苦心。在汉语中,“天”集哲学、审美、道德于一身,具有天道、客观规律的意蕴,“natural selec-

[1][3] 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查正贤译,刘健芝校,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第360页。

[2] 鹏劲松、李海军:《历史文化语境与翻译——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为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 邵霞:《论翻译话语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商洛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tion”译作“天演”体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道义的客观规律。此外,严复在《天演论》翻译中采用了增加按语、增评、删节和改写等归化译法把原文中的进化伦理观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在说明进化规律不仅适合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言说方式力图使冥顽不化的晚清士大夫们接受当时先进的西方思想意思,改革图强。冯友兰说:“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变成了最古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1]

与严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先生极力倡导的“异化”翻译策略。这与当时中国语文的缺陷密切相关,因此鲁迅自觉地将异化与改造中国语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不太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免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2]

总之,译者往往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和翻译文学文本,目的语读者的视域决定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选择、切割、认知和阐释。

2. 目的语接受环境的主体性 长期以来,西方奉行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哲学观:主体是人,接受环境是对主体形成制约的因素,是客体,两者是对立的、分离的。但是黑格尔消解了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哲学,张汝伦在《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文中阐述了黑格尔的观点:“主体不仅指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在一个对抗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就是存在。事物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种种变化,但仍是同样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主体。但是,真正能自觉地实现自己的主体是人,只有他有自我实现的力量,有在一切生成过程中成为自我决定的主体的力量。但是人这个主体不是绝对的,相对于绝对的精神(Geist)即体现为理性过程的历史世界,他又是客体,是精神这个绝对的主体实现自己的中介或手段(Medium)”^[3]。

马克思同样对西方传统的主体观念进行了颠覆:主体性并不是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是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是人的基本历史活动——劳动,而劳动是不为人的主观愿望左右的、自为存在的活动,也具有主体性的特征。马克思将主体和客体彼此换位,历史性的实践则是这种彼此换位的过

程。在文学翻译中,目的语接受环境的主体性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作为人的一种活动的历史性,在很多情况下,译者主体性尚不足以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构建全面而完整的翻译话语,译者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主体性,表面上看是译者背离了源语文本,彰显了主体性,实际上真正的主体性要素却是目的语接受环境中的某些组成部分。“通常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仅仅是译者,其实不然,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4]“文学翻译的接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目的语接受环境与话语里关乎权力和欲望的那部分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目的语接受环境会甄选、安抚、操控、支配、排斥甚至颠覆进入该环境的翻译话语,“为其预想的实际内容构画出了可能的、可观察的、可测量、可分类对象的各种框架;这种求知意志在一定意义上先于一切经验把某种位置、某种视线和某种功能(是观察而非阅读,是证实而非评论)强加在认知主体上。”^[5]比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由于法国在政治、军事、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他欧洲国家为法国马首是瞻,体现在法语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处理都要遵循法语的语法、词汇和语义规范,符合法国文学当时的分类形式和美学模式。葛浩文翻译的

[1]贺爱军、范谊:《翻译话语的演变与重铸》,〔西安〕《外语教学》2008年第6期。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3]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5页。

[4]谢天振:《译介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5]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狼图腾》在国外很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契合了当地人们关注环保和伦理等问题的文化语境。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推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寒山诗在中国本土几乎无人知晓,更谈不上什么文学地位,但1954年他的诗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后,“寒山在美国赢得了他在中国一千年也没有占上的文学地位。”学者研究发现:充满禅机和崇尚自然的寒山诗迎合了美国当时的学禅之风和嬉皮士运动。寒山本人衣衫褴褛、站在高山上迎风大笑的狂士形象也使得嬉皮士把他视为自己心中理想的英雄。在这个案例中,译者或读者的主观行为和作用并不突出,是整个接受环境发挥了主体功能,促成了“寒山热”^[1]。

3. 读者的主体性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具有哲学意义,它是人类主体的行为方式,更是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哲学阐释学反对理解文本就是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认为理解应该是从理解者自身的前结构出发,对文本做出与理解者自身情境相关的阐释。作者制造了文本,但是使文本进入话语事件并获得意义的却只有读者。该理论使读者在理解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指出:“《大个子魔纳》的奇妙性质,《阿尔芒斯》的雄伟风格,卡夫卡神话的写实和真实程度,这一切都从来不是现成给予的;必需由读者在不断超越写出来的东西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切。当然作者在引导他;但是作者只是在引导他而已,作者设置的路标之间都是虚空,读者必须自己抵达这些路标,它必需超过他们。一句话,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2]

文学翻译中,文本呈开放系统,意义被延异、被播撒,当译者作为原作的理解者彰显主体性地位的时候,其译作已不再是原作的忠实再现,而是成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以原作意义为基础的背离。与此同时,具有独立身份的译者还会向目的语读者发出邀约,邀请他们带着自身的视域走进文本的视域进行理解,去填补英加登所说的“不定点”和伊瑟尔所说的“空白”,并召唤一切由视域融合而产生的新意义,努力发掘译作中的潜在价值,使其成为现实价值。

如果将翻译文本的流传视为一个话语实践过程的话,译作的诞生其实并不意味着话语事件的终结,事实上,话语事件还在继续,因为目的语读者会带着自己的前结构对文本进行再次阐释,从而体现作者的唯一性与读者的无限性,原旨的唯一性与解读的多样性,作者的权威性与读者的能动性。理解不是主体的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事物本身和我们的前判断之间无穷的“游戏过程”。文本在社会中产生的功效最终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评论和接受,没有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不管译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译文都不会产生意义和影响。因此,“读者在生产意义这一点上与作者同样重要。每一个被给予和编入意义的能指必须由接受者从意义上加以阐释和解码。”^[3]

目的语读者内化了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规范,如果翻译文本冒犯了某种文化规范,目的语读者群中那些竭力维护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的当权者就有可能出面干预,他们不能容忍翻译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与他们对文本的期待格格不入。文学翻译话语在宣告建构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就行使了另一个言外行为,即利用文化惯例召唤读者利用语言一起想象一个世界,而读者需要一个能够支持自己希望的语境,这个语境由读者采用的一组假设构成,是认知环境的组成部分。目的语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话语的读者往往会听任自己的意愿或突发的灵感从话语中择取对他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从侧面的、边缘的、次要的方位进入文本,变更话语的施为性、建构性、表述性和指涉性关系,组成自己的独特视野和解读世界的方式。

[1]谢天振:《译介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2]萨特:《萨特文论选》,施廉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3][英]霍尔编:《表征:文化表现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页。

四、结语

文学翻译话语建构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作者、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中的任何一个主体均不能统摄整个话语事件,都不是绝对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不同的主体加入到文本的阐释中,参与意义的建构,形成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的活跃的活动场,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协商和对话从而达成一致,因此翻译主体是一个包含作者、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的多重主体,每个主体在文本阐释中承认他者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各主体呈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文学翻译话语构建的润滑剂,而积极、互动的主体间性为作者、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的和谐共存提供了可能,也为视域融合从而走向人类灵魂的沟通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毕竟是作者创造的文本,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强调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的重要性,作者对于文本意义的规定性是不可忽视的,译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必须在作者和文本对于意义的规定性中进行,不进入作者和文本的视域,理解就是脱离了主体间性的单向度理解。主体性必须是主体间性中的主体性。

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再现和分析源于事物本质和运动的冲突,考察文学不可能不涉及它赖以发展并为之奋斗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文学翻译亦如此。文学翻译作为语言间知识、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本身也是一种话语,文学翻译话语包含各种翻译理论、术语、技巧和文本等,所有翻译文本都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生成的,作为源于语言、又超越语言的语言实践活动,文学翻译话语被置于文化语境之中,与其他实践活动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人类的全部文明。文化语境视域下的文学翻译话语研究不仅能拓展翻译研究的思路和视野,更能对为什么产生某些作品做出有力的分析,从而触及时代的脉搏和译者的思想深处。

〔责任编辑:平 啸〕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Discourse

Li Xiaoho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ncounters obstacle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when it tries to translate literature from one culture context to another. It also constructs new literary translation discourse when it successfully removes the obstacles and manages to get integrated with the new culture context. Literary translation targets at literary works, and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genre of dis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grafting the meaning of source language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translators, in order to force target language's rights into context, would knowingly miss or divert some information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Authors, translators, readers and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re inter-subjective to one another in construct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discours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ontext.

Keywords: cultural context;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er-subjectivity